

襄助徐继畲撰研《瀛环志略》的 佚名年轻中国人小考*

莊 钦永

摘要 1848年，第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世界地理书《瀛环志略》在福州刊行。作者徐继畲在书内明言，撰研期间泰西人如雅裨理（David Abeel）等均予以协助。三年后，1851年，美部会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为这书撰写了一篇冗长的书评，揭露了一个外人全然不知的史实：其实除了几个泰西人外，徐氏尚取得一位曾在美国读书四年、年轻广东香山人的襄助。1840年回国后，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正如火如荼进行时，这位留美学生受聘担任英国战舰上的一名翻译。在当时这是汉奸的举止。因着这缘故，卫三畏为他隐姓埋名；徐继畲也不便提这事。究竟这个为敌国英方服务的译者是何许人，姓名谁？1957年，在卫三畏书评问世整整一个世纪后，美国学者多罗蒂·安·罗克威尔（Dorothy Ann Rockwell）翻阅美部会档案等文献，得知他名叫 Yung Mung Chum Akum（Akum 是其乳名），曾在美国麻省两所学校就读。又过了六十多年后，笔者发现在美国纽约历史协会档案部里，有一页志日 1839年8月26日 Yong Mon-Chun Akum（Yung Mung Chum Akum 之不同拼写）以中文亲笔抄写的主祷文，从落款确定他的中文姓名就是杨文俊，小名亚锦。

有关杨文俊到美国读书的传奇故事，台湾学者苏精教授前些时候费神劳心爬疏档案，写成学界第一篇，也是唯一的一篇弥足珍贵的文字。这篇论文立足于苏精先生之鸿文，据杨文俊当年所就读的学校文献、《中华丛报》上的报道，及英国驻日本外交官萨道义（Ernest Satow）的日记与回忆录等资料，略作一点拾遗补缺的工作。它或许能让我们对这位曾经襄助徐继畲撰研《瀛环志略》、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充当英方译者有多一点的认识。

关键词 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英方译者；徐继畲；《瀛环志略》；Akum；杨文俊

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英国海军实力异军突起。她先后击败法国、荷兰之舰队，控制了全球海权，主宰了世界贸易，并在各大洲建立了广阔的殖民地。因着这个原因，原是偏居一隅的日耳曼部落语言的英语就此得以在世界广为传播，跻身世界通用语之列。18世纪三十年代初以降，除了极少数在广州与英国人有贸易交易的商人或有交涉的买办、通事，愿意学习一点实用洋泾浜英语外，具有根深蒂固、浓烈“夏夷之辨”思想意识的中国人，是不屑学习这些“番鬼”所说的“鬼话”¹。这种情形在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开始发生变化。悲剧民族英雄钦差大臣林则徐奉命在

*笔者衷心感谢美国麻省伍斯特历史博物馆档案与图书部（Worcester Historical Museum Library and Archives）馆长温迪·伊瑟丽（Wendy Essery）、纽约历史协会图书馆档案部（Manuscript Department, 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 Library）主任特·欧赖利（Ted O'Reilly）代笔者搜索有关杨文俊之资料，

粤查办鸦片期间，除了向懂得汉语的泰西人求助外，² 为了“探访夷情，知其虚实”，用“以定控制之方”，³ 也为了了解域外世界，他雇佣了四名有英语知识的中国人，把访获敌方的书信，译出汉文；或翻译广州、澳门以及新加坡等地出版的英文报纸，以及苏格兰地理学家慕瑞(Hugh Murray)的《世界地理大全》(*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等书刊。这是学界皆知的史实。

1848 年，被美国人称誉作“东方伽利略”的封疆大臣徐继畲在福州刊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世界地理书《瀛环志略》。三年后(1851 年)，美部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 1812-1884)在其所主编英文月刊《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上发表了一篇冗长的书评。卫氏在文章里除了极力赞赏徐继畲在地理学上所取得的突破与成就，并指出书中的一些错误外，揭露了一个外人全然不知的史实：徐氏在撰写此书期间，除了取得刚于四年多前弃世的同仁雅裨理(David Abeel)的帮助外，就像林则徐一样，他也借助一位懂得英语的中国年轻人的襄助。卫氏说，这位中国人

*from Hiangshan, who had at that time recently returned from a four years' sojourn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he had learned to read and write English tolerably well. This young man was engaged as interpreter by Capt. Smith of H. M. S. Druid, but his knowledge of his own language and the Amoy dialect was so imperfect that his interpretation was not very satisfactory in communication with either commoners or officials. We think it not unlikely that this young man may have been called on by Judge Sü to translate the compends of geography and history he had brought with him from New York, a service which he was quite able to perform viva voce in his own dialect.*⁴

并慨然同意在本文中复制两馆所珍藏的图片，增加本文的光彩。笔者也感谢好友蔡锦图博士提供 1837 年麦都思等四人小组翻译、在巴达维亚出版的《新遗诏书》内主祷文的文字。

¹ 例如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广州刊行一本教人懂得一些简单英语的小册子，就使用“鬼话”这蔑称来指称英语，书名叫做《红毛买卖通用鬼话》。参阅 Samuel Wells Williams, “*Gaoumun fan yu tsã tsze tesuen taou, ……*,”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6, no. 6 (October 1837), pp. 276-279; W.C.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 Co., 1882), p. 63; 内田庆市、沈国威编著：《言語接触とピジン——19 世紀の東アジア》，白帝社，2009，第 183~187 页；周振鹤：《〈鬼话〉》、《〈鬼话〉、〈华英通语〉及其他》，均载《逸言殊语》(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 22~23，94~106 页。

² 例如 1839 年 6 月至 8 月，在中英关系逐渐恶化时，林则徐通过密使与当时在广州行医的眼科医生、美部会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医生有几次间接的接触。6 月 10 日，三位密使与伯驾谈论地理学，后来伯驾赠送给林则徐一册地图集、一部地理书及一个地球仪。7 月，林则徐命人到伯驾那里请他将滑达尔(Emmerich de Vattel, 1714-1767)的《各国律例》(*The Laws of Nations*)中的一些条款翻译成中文。参阅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89-90.

³ 《责令澳门葡人驱逐英人情情形片》，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第三册《奏折》，第 290 页。

⁴ Samuel W. Williams, “The Ying Hwan Chi-lioh,”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0, no. 4 (April 1851), p. 170.

中译文：

来自香山。他那时刚刚在旅居美国四年后回国，他在美国学习英语，读、写都还算不错。这位年轻人当时是英国皇家战舰“都鲁壹号”船长士密的翻译，但他对本国语言及厦门方言的知识都很贫乏，以致外国人和中国官员对他的翻译都不满意。我们认为很可能这位年轻人曾受徐按察使的召唤，让他翻译他从纽约带回来的地理书和历史书的纲要，他大可用自己的方言进行口译。⁵

对上引的记载，吴义雄先生“相信卫三畏不会无端杜撰这一个故事。这则史料证明徐继畲为了其著作的准确性，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一位为敌国服务的中国人，标准的定义是汉奸。”⁶ 对于此事，徐继畲只字不提，卫三畏也替他隐姓埋名。

一、佚名襄助者中英文姓名发现之经过

究竟这个在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为敌国英方服务的译者是何许人，姓甚名谁？

就在卫三畏那篇书评刊载整整一个世纪后，1957年，美国学者多罗蒂·安·罗克威尔（Dorothy Ann Rockwell）为学界侦破这悬案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刊行的《中国论丛》第11期上，罗克威尔发表了海外第一篇研究《瀛环志略》的论文——《徐巡抚〈瀛环志略〉之编纂》。她查阅美部会档案与威廉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肄业生名录，得知这个年轻人名字叫 Yung Mung Chum，⁷ 当时旅居广州的传教士则叫他做 Akin。他来自中国的 Chihung chun，先在麻省的莱斯特学校（Leicester Academy）就读，1839年冬又进入威廉斯学院学习，1840年6月回国。⁸ 可惜，罗克威尔所见的资料均没提供这名中国学生的中文姓名。

又过了六十多年，2019年，笔者读到1892年麻省的伍斯特文物学会（Worcester Society of Antiquity）年刊上的一篇文章。它是该学会的一名活跃会员在追思不久前离世的老同学、哈佛大学第二十任校长汤姆斯·禧尔（Thomas Hill）的演讲稿。文章接尾部分，她提及伍斯特文物学会藏品中有当年禧尔就读莱斯特学校时，Yun Mun Chun Akum（Yung Mung Chum Akum 的不同拼写）送

⁵ 中译文据吴义雄：《西方人眼里的徐继畲及其著作》，载虞和平、孙丽萍主编：《穿越时空的目光：徐继畲及其开放思想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207页。

⁶ 同上注。

⁷ 其实，莱斯特学校、威廉斯学院，以及美部会档案的记录也有将其姓名拼写作 Y. M. C. Akum。参阅 *Catalogue of the Trustees, Instructors, & Students of Leicester Academy, Massachusetts, for the Year Ending August 14th, 1839* (Worcester, Mass.: Printed at the Spy Office, 1839), p. 5; *Catalogue of the Corporation, Officers and Students of Williams College, 1839-40* (Troy, N.Y.: N. Tuttle [printer], 1839), p. 13.

⁸ 此处罗克威尔根据美部会档案志日1840年6月26日伯驾的记录，其后志日7月15日的印刷公开信也拼写作 Akin，它应是杨文俊小名“阿锦（金）”之官话拼写（“锦”、“金”粤语同音，读作 Akum）。参见 Dorothy Ann Rockwell, “The Compilation of Governor Hsü’s *Ying-huan chih-lüeh*,” *Papers on China*, vol. 11 (1957), p. 10, 26 note 43; 苏精：《早于容闳在美读书的华人》，《上帝的人马：十九世纪在华传教士的作为》，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06，第87页注37。

给他以中文抄写的主祷文及其他纪念品。⁹ 这主祷文既是用中文书写，Akum 或许在落款会写下他的中文姓名。于是，我马上给今天已改称伍斯特历史博物馆（Worcester Historical Museum）写信，请有关负责人代为搜寻这纸主祷文的下落。¹⁰ 其后，Wendy Essery 女士寄来那纸主祷文（见插图 3）和两幅图画（一幅画的是 Leicester Academy [莱斯特学校，见插图 2]，另一幅题名作 Talo Plant [芋]）。同样的，除了当年 Akum 亲笔在各文献上所写的题名外，它们均未签署其中文签名。

2021 年 1 月底，出乎我意料之外，纽约历史协会图书馆档案部竟度藏有另一纸 Akum 亲笔抄写的主祷文。它夹杂在《罗伯特·沃特斯档案，1692~1839 年》（Robert Watts papers, 1692-1839）中。¹¹ 沃特斯家族是纽约有名望的家族。约翰·沃特（John Watts, 1715-1789）是纽约郡（New York Province）的成功商人，也是总督政务会（Governor's Council）中的一名成员。1752 年，他为纽约州议会的议员及纽约医院管委会主席。翌年，创办纽约学会图书馆（New York Society Library），是该图书馆十二位信托人之一。其长子罗伯特（Robert Watts）创立纽约商会（New York Chamber of Commerce）。这组案卷凡四盒，年份虽起自 1692 年，但其中绝大部分文件志日介于 1778 至 1839 年。它们都是一些法律文件如沃特家族三代成员的遗嘱及他们在纽约市、纽约州及新泽西州土地业权的法律证件，以及他们的来往书信等等。

对于这一页主祷文，我还想再碰一下运气，看看它是否有落款。我给该历史协会写信，几天后，接到复函并文件复制品（以下简称作《纽约本主祷文》）。乍看之下，惊喜万分。纸上的文字书写格式是中西合璧。中文竖书，行序自右而左；英文横写，行序自左而右。

⁹ Rufus N. Meriam, "My Academic Reminiscences of the Rev. Thomas Hill, D.D., LL. D.," in *Proceedings of the Worcester Society of Antiquity for the Year 1892* (Worcester, Mass.: Published by the Society, 1893), pp. 284-285.

¹⁰ 伍斯特文物学会是在 1875 年创立。1919 年，易名伍斯特历史学会（Worcester Historical Society）。1978 年，又再改用今名。又，对 Wendy Essery 女士，笔者再次献上衷心的谢忱。犹记第一次给伍斯特文物学会写信，Wendy 复函云，由于她刚上任，对馆藏资料完全不熟悉，无法提供协助，深感抱歉。对此，我完全能理解。但我没料到，她却还是惦念这事，直到好长的一段时间后，忽然接到她的来信，说我所要的资料找到了。那时，我心中对 Wendy 之服务精神与态度既是感动又是感激。

¹¹ Lord's prayer in Chinese, written in 1839 by Yong Mon-Chun Akum, in Robert Watts papers (1692-1839), Box 1. 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

毫无疑问, 这个 Yong Mon-Chun Akum、C. Akum, 就是 Yung Mung Chum、Yun Mun Chun Akum, 与伍斯特历史博物馆三件文献上的 Y M C Akum, 或苏精先生文中的 Y. M. C. Akum¹²所指其实是同一个人。

从《纽约本主祷文》中 R. 肯尔尼所写题记, 我们知道这页的主祷文是由一位刚考进麻省威廉斯学院、有志与学成后献身宣教事业的 Mr Akum 所抄写。抄录日期: 1839 年 8 月 26 日; 地点: 位于上雷德胡克 (Upper Red Hook) 肯尔尼的书房内。合理的推论是: 1839 年秋, 杨文俊报进威廉斯学院深造。¹³ 乘学院尚未开学之前, 他到纽约旧地重游。8 月 25 日, 星期天, 他来到坐落在雷德胡克的圣保罗教堂 (St. Paul's Church) 参加主日崇拜聚会, 顺便探望当年救济他的主日学老师 (说见下)。翌日, 星期一, 年近知天命的教会牧师肯尔尼接待这位来自远方的异邦弟兄。两人在书房内促膝闲聊,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递给杨一页纸, 请他以中文抄写主祷文及中国特有的数字书写方式。¹⁴

R. 肯尔尼究竟是什么人? 为什么一页不具法律性与任何经济价值的主祷文竟出现在沃斯特家族档案中? 翻查沃特家族的族谱, 发现原来肯尔尼家族与沃特斯家族有姻亲关系。R. 肯尔尼, 全名 Ravaud Kearney (戴武·肯尔尼)。戴武的母亲苏珊妮·沃特斯 (Susanne Watts) 即是约翰·沃特斯 (1715-1777) 的三女,¹⁵ 她与菲力普·肯尔尼 (Philip Kearney) 缔结良缘, 共有十二个儿女。排行第十的戴武约于 1790 年出生。¹⁶ 后来, 戴武的千金玛丽 (Mary) 嫁给他的堂兄艾塞克斯·沃特斯 (Essex Watts)。¹⁷

¹² 见苏精:《早于容闳在美读书的华人》, 第 87 页。按, 除了 Yung Mung Chum、Yun Mun Chun Akum 外, 笔者所见尚有 Yung Mung Chung Akum、Yong Mong Chung Akum 等不同拼写。参见 *The Centenary of Leicester Academy Held September 4, 1884* (Worcester, Mass.: Printed by Charles Hamilton, 1884), p. 80; Meriam, "My Academic Reminiscences of the Rev. Thomas Hill, D.D., LL. D.," p. 284; *General Catalogue of the Non-graduates of Williams College 1910* (Williamstown, Mass.: Published by the College, 1910), p. 19; William S. Cooper, "Communication," *The Williams Alumni Review*, vol. 3, no. 2 (April 1911), p. 5.

¹³ 考试包括: 地理、英文、拉丁语、希腊文法及古典作品等科目。参阅 *Catalogue of the Corporation, Officers and Students of Williams College, 1839-40*, p. 15.

¹⁴ 参阅《纽约本主祷文》肯尔尼之题记。这三种中国特有的数字书写方式分别是小写数字 (即“三”、“四”、“五”)、大写数字 (即利用与数字同音的繁体字取代数字, 如“叁”、“肆”、“伍”) 和传统苏州码子 (即“川” [三]、“メ” [四]、“𠄎” [五])。

¹⁵ 苏珊妮·沃特是于 1751 年 2 月 24 日在纽约出生, 卒年不详。参阅 *Watts (Watt) [in New York and in Edinburgh, Scotland] and Watts, Wattes, Wattys, Wathes, de Watt, Le Fleming*, all prepared by Albert Welles (New York: Charles H. Ludwig [printer], 1898), p. 6.

¹⁶ *Watts (Watt) [in New York and in Edinburgh, Scotland]*, p. 17.

¹⁷ 艾塞克斯·沃特斯在 1819 年出生, 父亲罗伯特·沃特斯 (Robert Watts, 1784-1850) 即是约翰·沃特斯的长子。参阅 *Watts (Watt) [in New York and in Edinburgh, Scotland]*, pp. 10-12.

戴武·肯尔尼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新教教徒。1817年，当他约二十七岁时，就被按立成为圣公会的牧师。¹⁸此后，终其一生在纽约州内的教会服务，先后担任安大略县（Ontario County）卡南代瓜（Canandaigu）的圣约翰教堂（St. John Church）、¹⁹阿尔斯特县（Ulster county）的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以及坐落在上雷德胡克（Upper Redhook）与沃特斯家族有密切关系的圣保罗教堂的教区长。²⁰

纸张右边是 Akum 抄录自《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六章第9~13节、今天基督徒最为熟悉、在聚会时常背诵的主祷文。²¹落款：

羊

杨文俊亚锦（列福）八月二十六日

八月二十六日一千八百三十九年

抄录者自称是“羊”，意思即他是耶稣降世人间所要寻找到的一头迷失的羊（罪人）。²²“列福”即 Redhook 的汉字拼写。落款证实那位襄助徐继畲撰写的年轻华人名字叫做杨文俊，粤语读音拼写作 Yung Mung Chum，乳名亚锦则拼写作 Akum。²³

这一页毫无经济价值的纸张，充满爱心的肯尔尼异常珍惜。后来他可能将它转交与女婿艾塞克斯·沃特斯保管，最终与沃特斯家族的一批重要文件一起存入《罗伯特·沃特斯档案》里。它之所以能留存至今，反映了一位牧师对一个立志献身宣教事业异邦信徒的真情厚义，也因着这缘故，他也为史学界保留了珍贵的史料，让一百八十多年后的学者从中知道有关杨文俊的籍贯、年龄、在美国读书的概况等极其难得的资讯。

二、在美国读书、四年后回国

1800年，受英国宗教觉醒运动之波及，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掀起了一股宗教热忱，推动了持续七十年的布道运动，史称“第二次大觉醒运动”（Second Great Awakening）。这场轰轰烈烈的宗教运动，席卷美国大部分地区，“人们经历了一次有史以来范围最为广泛、规模最为宏大的复

¹⁸ *Journal of the Convents of 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 in the Diocese of New York* (New York: Henry M. Onderdork, 1844), p. 366.

¹⁹ *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Forty-Fifth Convention of 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 in the State of New-York* (New-York: Printed at 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Press, 1830), p. 4.

²⁰ *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Bishops, Clergy, and Laity of 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a General Convention, Held in the City of Philadelphia, from September 5, to September, 17, Inclusive, A.D. 1838* (New-York: Swords, Stanford & Co., 1838), p. 152; *The History of Ulster County, New York*, edited by Alphonso T Clearwater (Kingston, New York: W. J. Van Deusen, 1907), vol. 1, p. 466.

²¹ 《路加福音》11章2~4节也有主祷文，惟文字与《马太福音》稍有不同。

²² 参阅《马太福音》十八章12~14节；《路加福音》十五章第3~7节。

²³ 据欧德理《粤语字典》，“杨”、“文”、“俊”三字分别拼写作 Yéung、Man 及 Tsun；“亚”、“锦”二字则拼写作 á、kam。参阅 Ernest John Eitel, *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London: Trübner & Co.; Hong Kong: Lane, Crawford & Co., 1877), pp. 2, 213, 411, 834 & 990.

兴。”²⁴ 美国的基督徒效仿英国差会的模式，成立不少宣教团体。1812 年，正当人们热烈谈论国内战争之时，在波士顿市东北约三十英里的贸易商港塞勒姆（Salem）成立了第一个海外宣教团体——美部会。这差会虽然是由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成员所创立，但基督徒却超越宗派障碍，自由支援它的事工。1830 年 2 月，它派遣传教士裨治文与雅裨理一起抵达古老的中华帝国。1833 年 10 月，帝礼士（Rev. Ira Tracy）也抵达广州。

就在差不多同一个时候，一位富于冒险性格的中国人杨文俊，横渡重洋，后来在美国接受教育，皈依基督教，且决意回国后，献身教会，传讲福音。多年前，台湾学者苏精费心耗神爬梳美部会、美国长老传教会档案，把杨文俊在美国的传奇事迹给勾勒出来，写成史学界第一篇、也是唯一的一篇相关文字，弥足珍贵。这里笔者仅据一些新发掘的史料略作拾遗补阙。

杨文俊何许人也？卫三畏说他是香山人。杨文俊本人在报读莱斯特学校时，说他来自 Chihung-Chung, China。²⁵ 如此看来，Chihung-Chung 当是清代香山县长乐乡“赤坎村”三字之粤语拼写。²⁶ 这个位于珠江三角洲西南部、开平县正中的村庄，距离今天江门的开平市区约 12 公里，四周被潭江支流水系包围，沿潭江可通航到广州、香港、澳门，与肯尔尼所说“他出生于距离中国广州约六十英里，面向海岸的内陆”吻合。

杨文俊在 1821 年（道光元年）或 1822 年（道光二年）出生，那时正是爱新觉罗·旻宁登基成为满清六世皇帝之时。²⁷ 约 1835 或 1836 年，由于想看看域外辽阔的世界，这个仅仅是十四五岁的年轻人，瞒着双亲，一声不响地只身乘船，踏上那漫长、充满未知的旅程，横渡重洋到遥远的太平洋彼岸，来到中国人叫它做花旗国或美利坚合众国的纽约。²⁸ 抵达不久后，盘缠俱已用尽，身在异国他乡，人生地疏，孤身一人，举目无依，逼得流落街头。就在这个时候，十多二十年前娄亚谷（Lowe-Ah-Cook）流落纽约的故事再次重演。²⁹ 杨文俊幸遇一位有怜悯爱心的女主日学老师收

²⁴ Andrew Reed and James Matheson, *A Narrative of the Visit to the American Churche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35), vol. 2, p. 10.

²⁵ *Catalogue of the Trustees, Instructors, & Students of Leicester Academy, Massachusetts, for the Year Endings August 14th, 1839*, p. 5; *Catalogue of the Corporation, Officers and Students of Williams College, 1839-40*, p. 13.

²⁶ 据欧德理《粤语字典》，“赤”、“坎”、“村”三字分别拼写作 ch'ik hom ts'un。参阅 [清]田明曜，陈澧纂：《香山县志》卷五《輿地下》，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 71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影印清光绪刻本，第 5 页 b；Eitel, *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pp. 57, 168 & 838.

²⁷ 《纽约本主祷文》载，杨文俊“年约十八岁”。假如这是西方人的实岁，逆推上去，则杨文俊当生于 1821 年；如果是虚龄，那他是在 1822 年出世。

²⁸ “Intelligence. Converted Chinese Youth” 和 Cooper 的记载均说杨文俊流落美国费城，但杨文俊的同窗汤姆斯·禧尔（Thomas Hill）却说是在纽约。苏精据美部会档案所记是在纽约，此从苏说。参阅苏精：《早于容闳在美读书的华人》，第 87 页；“Intelligence. Converted Chinese Youth,” *The Monthly Miscellany of Religious and Letters*, vol. 4, no. 3 (March 1841), pp. 177-178; Cooper, “Communication,” p. 5; *The Centenary of Leicester Academy Held September 4, 1884*, p. 79.

²⁹ 苏精：《早于容闳在美读书的华人》，第 77~80 页。

容他，帶領他到教會（應是坐落在紐約上雷德胡克的聖保羅教堂）參加每個星期的主日學，學習英文。約一年後，楊文俊接受了基督教信仰。³⁰

那時麻薩諸塞州中部萊斯特位於伍斯特縣（Worcester county）西部六英里，有村落名萊斯特（Leicester），人口不多，約有 1800 名，但它卻有一所名聞遐邇的私立男女混合寄宿學校——萊斯特學校（Leicester Academy）。19 世紀二十年代末，麻省有五十八所學校。³¹ 萊斯特中學為該省的第二所學校。它是在 1784 年由曾參與美國革命戰爭的兩位將領雅各·戴維斯（Col. Jacob Davis）和以便以謝·克拉弗斯（Col. Ebenezer Crafts）出錢購置一所舊房子及周圍的土地，發起籌建。他們的義舉獲得鎮政府以及社會各界善翁義士在經濟上熱烈的支援。³² 自創辦半個世紀以來，它一直是伍斯特縣一所名聲響當當的名校，為進入學院準備、遠道而來報讀者眾多。³³ 女主日學老師為楊文俊集金籌款，讓他進入這所名校讀書。

楊文俊就讀萊斯特學校的時候，校長是 1822 年耶魯學院的畢業生路德·萊特（Luther Wright, 1796~1870；在職年份：1833 年 8 月至 1839 年 8 月）。他是麻省伊斯特漢普頓（Easthampton）人。在耶魯畢業後，他留任助教（tutor）數年，與此同時，修讀神學課程，最終成為合格的牧師。在接任萊斯特第十二任校長之前，他先後在馬里蘭州，以及康涅狄格州的埃靈頓（Ellington）擔任副校長。³⁴ 在萊特的領導之下，學生人數增加。楊文俊在校最後一年，即 1839 年，學校共有二百七十名學生，其中男生一百八十七名、女生八十三名。³⁵ 1841 年，楊文俊畢業兩年後，萊特回到家鄉出掌威利斯顿學校（Williston Seminary），直到 1849 年辭職。³⁶ 威利斯顿學校與晚清中國的

³⁰ “Intelligence. Converted Chinese Youth,” p. 178.

³¹ “Academics in New England,” *The Quarterly Register an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 Society*, vol. 8 (April 1829), p. 236.

³² Emory Washburn, “Top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Town of Leicester,” *The Worcester Magazine and Historical Journal*, vol. 2, no. 2 (June 1826), pp. 78-81; A. H. Coolidge, *A Brief History of Leicester, Massachusetts* (s.l.: s.n., 1890), pp. 25-31.

³³ William G. Land, *Thomas Hill, Twentieth President of Harvar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p. 31.

³⁴ Payson W. Lyman, *History of Easthampton: Its Settlement and Growth* (Northampton: Trumbull & Gere, 1866), pp. 170-171; Joseph Henry Sawyer, *A History of Williston Seminary* (Eastampton: Trustees of Williston Seminary, 1917), pp. 75-76.

³⁵ *Catalogue of the Trustees, Instructors, & Students of Leicester Academy, Massachusetts, for the Year Ending August 14th, 1839*, pp. 5 & 11.

³⁶ Coolidge, *A Brief History of Leicester, Massachusetts*, p. 29.

教育史是有密切的关系。1872 年至 1875 年，清廷派遣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官费幼童学生赴美留学，其中有六名就曾在这间学校读预科。³⁷



插图 2: 《莱斯特学院》，杨文俊绘于 1839 年。它是赠送与禧尔的纪念品。

图中的学院于 1833 年落成，建筑费一万元。

画作下之题名及落款出自杨文俊之手笔

美国麻省伍斯特历史博物馆档案与图书提供

在学校三四年，杨文俊学习英文、拉丁文、希腊文与法文，也修读古典学、地理、历史、写作法与数学等课程。学校采用的课本是当时美国学校普遍使用的，³⁸ 例如地理课本采用威廉斯学院毕业生、天文学家与教育家伊莱沙·布瑞特 (Elijah H. Burritt, 1794-1838) 编写的《天文地理学》(*Geography of the Heavens*)、³⁹ 雅斯·欧尼里 (Jesse Olney, 1788-1872) 编写的《实用现代地理》(*A Practical System of Modern Geography*)；⁴⁰ 历史课本则采用在耶鲁大学执教多年查尔斯·伍瑞志 (Charles A. Goodrich, 1790-1860) 编写的《美国历史》(*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³⁷ 钱钢、胡劲草：《大清留美幼童记》（增订本），（香港）中华书局，2009，第 306~307、316~317、322~323、326~327、334~335 页。

³⁸ *Catalogue of the Trustees, Instructors, & Students of Leicester Academy, Massachusetts, for the Year Endings August 14th, 1839*, p. 12; Emory Washburn, *Brief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Leicester Academy. Part I* (Boston: Phillips, Sampson & Co., 1855), p. 31.

³⁹ 关于布瑞特的生平与著作，参见 Albert T. Brooks, "Elijah Hinsdale Burritt: The Forgotten Astronomer," *Popular Astronomer*, vol. 44 (1936), pp. 293-298.

⁴⁰ 《实用现代地理》初刊于 1828 年，至 1851 年已经印刷了六十三版。参阅 John A. Nietz, *Old Textbooks*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61), p. 228.

⁴¹ 等等。据他的同学说，杨文俊的学习成绩在中等以上。杨文俊在学校所接受的语文教育与世界地理、美国历史的知识，是后来徐继畲要借助于他的主要原因。

杨文俊进入莱斯特读书时，三层楼高的新校舍刚落成几年。楼下房间用作教室、校长的住家，二楼与三楼则是师生宿舍。⁴² 由于全校师生同住在一栋楼，日夜相处，师生同学之间的认识较深，关系密切，感情也较深厚。就像当时多数学校一样，莱斯特学校校园内宗教氛围浓厚。早在准备进入莱斯特时，杨文俊已皈依基督教。对此美部会、美国长老传教会领导人已略有耳闻。其中一个机构（应是美部会）送他一本不久前刊行的《新约全书》。如今杨文俊与一批热心基督徒师生同住一栋楼一起学习生活，信仰也变得更加坚实。⁴³ 最迟在 1838 年，也就是在莱斯特最后一年时，杨文俊已心誓旦旦表示将来学成回国后，愿意献身宣教事业，向同胞们传讲福音。⁴⁴

自莱斯特毕业后，1839 年秋，杨文俊进入麻省的威廉斯学院。威廉斯学院是在 1793 年创立的一所学院，以创办人以法莲·威廉斯（Ephraim Williams）的姓氏命名。学院的宗旨是培养牧师、医生、教师与学术人员等专业人才。⁴⁵ 学院设备先进，校园内建有美国第一个天文台。当时与杨文俊一起入学的新生共有三十四名，⁴⁶ 学校安排他和来自康涅狄格州格兰比（Granby）的 J. Cotton Strong 住同间宿舍。

就像当时绝大多数学院一样，威廉斯学院校园内的宗教氛围极其浓烈。1810 年，威廉斯学院内的学生信仰火热，最终导致美部会的创立，掀起了海外宣教热潮。⁴⁷ 二十多年后，这种狂热宗教热忱依然沿袭下来。学院有教堂。杨文俊进入威廉斯时，出掌校务是四年前刚上任的第四任院长马可·霍普金斯（Mark Hopkins, 1802-1887, 1835~1872 在职）。他是威廉斯学院的校友，1824 年度的毕业后，留校担任导师（tutor）两年，1830 年升任教授，教导道德哲学。担任院长期间，他与其在校教导数学、自然哲学的弟弟艾伯特·霍普金斯（Albert Hopkins, 1807-1872）俩热心在学生间传讲《圣经》的教训，赢得学生的尊重。艾伯特带领学院午间的祷告集会，也负责照顾学生的

⁴¹ 截至 1834 年，《美国历史》共印刷六十四版。参阅 Nietz, *Old Textbooks*, p. 265.

⁴² “History of Leicester Academy,” *The American Quarterly Register*, vol. 7 no. 1 (August 1834), p. 52.

⁴³ 杨文俊同年的同学如安吉尔（Marshall B. Anger）、克拉克（Rev. Thomas W. Clark）和利弗莫尔（Daniel P. Livermore）等均在毕业后献身教会，担任牧师。参阅 Cooper, “Communication,” p. 5; Meriam, “My Academic Reminiscences of the Rev. Thomas Hill, D.D., LL. D.,” p. 284.

⁴⁴ Cooper, “Communication,” p. 5.

⁴⁵ 关于威廉斯学院创校的背景，参阅 R. Cragin Lewis, editor, *Williams 1793-1993: A Pictorial History* (Williamstown, Mass.: Williams College Bicentennial Commission, 1993), pp. 8-27.

⁴⁶ 当年全校学生凡一百三十六名。

⁴⁷ Lewis, ed., *Williams 1793-1993*, pp. 35-38.

属灵生活。⁴⁸就在这种环境下，杨文俊矢志投身于传教事业的信心也变得更为坚固，⁴⁹他的同窗多有献身出来。成为传教士到印度等地当宣教。⁵⁰

在学校孜孜不倦地学习古典学等课程，杨文俊的成绩超越一般学生。然万没料到，就在第一个学期即将结束时，在家乡苦苦等待儿子回家的双亲，虽不知儿子究竟在何方，从中国寄出一通信封上只写收信人之名（当然是中文姓名）、没有地址的家书，但它却奇妙地送到杨文俊手中。看了信后，杨文俊决定回乡。⁵¹ 回国之前，1840年1月，他拜访了美部会秘书安德森（Rufus Anderson），后者还托他带了一封信给在广州的裨治文；他也向美国长老会秘书娄理华（Walter Lowrie）道别。

⁵²

1840年6月19日，杨文俊终于抵达澳门，回到阔别四年的祖国。三天后，他拜访了裨治文，把安德森的信交给他。身为美部会领导，安德森不言而喻希望杨文俊有机会参与中国的布道工作，襄助广州的同工。在给母会安德森复函时，裨治文认为杨文俊的英文很好，但已忘了中文，以致程度差得几乎无法阅读。又说，他很了解基督教教义，但仍需要细心指点。对此，裨氏表示愿意教导，不过这有待其父亲是否同意。⁵³

尔后，杨文俊父亲从乡下到澳门见儿子，接他回家。在异乡饱受孤独的他，如今久别重逢，深深感受到父亲真挚的爱与家庭的温暖。踌躇满志、愿意献身教会事工的他，如今得面临现实的考验了。父亲坚决要他放弃基督教信仰。面对父亲强硬的态度，孝顺的杨文俊唯有服从，最终裨治文只好放弃接纳杨文俊为同工；杨文俊也不得不放弃离美前答应陪同长老会传教士前往新加坡一行的承诺。

再过六天，6月28日，神州东南沿海炮声隆隆，硝烟漫天，英国远征部队揭开了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的帷幕。回家住了一个多月后，杨文俊不得不改变原有的计划，转回澳门，与马礼逊纪念学校的教师鲍留云（Samuel Robbins Brown）夫妇同住在大三巴旁、马礼逊教育会的会址上的一所葡式大屋，和鲍留云一起研读中英文，⁵⁴ 并协助刚在七个月前才正式开学的教学工作。当时学校

⁴⁸ Lewis, ed., *Williams 1793-1993*, pp. 57 & 66.

⁴⁹ Cooper, "Communication," p. 5.

⁵⁰ 例如同班同学 William Austin Benton 后来成为传教士，到叙利亚去宣教。参阅 *Obituary Record of Graduates of Yale College Deceased During the Academical Year in June 1875...*(New Haven, Conn.: Yale College, 1876), p. 186.

⁵¹ Cooper, "Communication," p. 5; 苏精：《早于容闳在美读书的华人》，第 87 页。按，在杨文俊离开威廉斯学院七十多年后，1913 年，即满清政府被推翻后二年，学院才迎来第二个华人学生 Tse-Ki Chow。参阅 *The Williams Alumni Review*, vol. 5, no. 4 (October 1913), p. 3.

⁵² 苏精：《早于容闳在美读书的华人》，第 87 页。

⁵³ 苏精：《早于容闳在美读书的华人》，第 87 页。

⁵⁴ 苏精：《早于容闳在美读书的华人》，第 88 页。

有學生約十一名，包括近代著名企業家唐廷樞的兄長廷植，以及後來成為第一位留美醫學博士黃寬等。⁵⁵

1840年8月15日，楊文俊從澳門給老嫗理華寫信，告訴他回國後的情況。信中流露他盼望回美完成教育的意願。但在父親不讓他走，同時也缺乏盤纏的兩難下，只好作罷。⁵⁶此時此境，楊文俊深感灰心喪志。他寫信給美國同學，表示很想放棄信仰。⁵⁷當時在威廉斯學院教導他希臘文、拉丁文的以便以謝·克洛吉（Ebenezer Kellogg, 1789~1846）老師也關注他在信仰面臨的困境。⁵⁸昔日在美的理想與抱負，今日逐漸地為現實所吞噬。他的信心慢慢地被殘酷的现实腐蝕，此後，慢慢地他離開信仰群體，成為教會圈外的邊緣人了，“傳教士們似乎也沒有在通信中再提到他”⁵⁹了。

三、從抄錄的《主禱文》窺視楊文俊的中文程度

在寫給母會秘書安德森的信中，裨治文提及楊文俊已經忘了中文，程度差得幾乎無法閱讀。⁶⁰這評說是否言過其實？

楊文俊在美國讀書期間，曾以中文抄錄主禱文，分別送與同窗禧爾（《伍斯特本主禱文》）和肯爾尼牧師（《紐約本主禱文》）。主禱文是耶穌教導門徒禱告要用怎樣的言語禱告，經文見於《新約聖經·馬太福音》第六章第9~13節，類似經文見《路加福音》第11章第2~4節。前者是19世紀與今天的基督徒熟悉背誦的經文。這裡我們以《伍斯特本主禱文》為例來窺視楊文俊的中文程度。楊文俊據以抄錄的經文是1837年巴達維亞刊行的麥都思等四人小組譯本《新遺詔書》（即《新約全書》）。這譯本第一卷書《馬太傳福音書》第11章載：⁶¹

⁵⁵ 馬禮遜紀念學校是在1839年11月4日正式開學。唐廷樞、黃寬分別是在1839年11月4日、1840年3月13日入學。參閱張偉保：《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馬禮遜學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第52~54頁。

⁵⁶ 蘇精：《早於容闈在美讀書的華人》，第88頁。

⁵⁷ “Intelligence. Converted Chinese Youth,” p. 178.

⁵⁸ Cooper, “Communication,” p. 5. 有關 Ebenezer Kellogg 之生平及其與威廉斯學院的關係，參見 Mark Hopkins, *A Sermon Occasioned by the Death of Prof. Ebenezer Kellogg, Delivered in the Church in Williamstown, on Sabbath Afternoon, Oct. 11, 1846* (Boston, Mass.: Press of T. R. Marvin, 1846).

⁵⁹ 蘇精：《早於容闈在美讀書的華人》，第89頁。

⁶⁰ 蘇精：《早於容闈在美讀書的華人》，第87頁。

⁶¹ 截至1838年，新教傳教士所翻譯的中文《新約全書》與單卷本有：（1）馬禮遜、米爾合譯的《神天聖書》（1823年馬六甲英華書院出版）；（2）單卷本《馬太傳福音書》（1836年夏葺書院刊行）；（3）尚德者纂《新遺詔書》（1837年巴達維亞出版）。翻閱《神天聖書》，發現其譯文與楊文俊抄錄者完全不同。《馬太傳福音書》大部分譯文與楊文俊抄錄者相同，但第六章第10節則不尽相同，作“爾國臨至，爾旨得成”，而《新遺詔書》則譯作“天國臨至，聖旨得成”，與楊文俊所抄錄的文字吻合，因此我們得以確定楊文俊所擁有的《聖經》是1837年巴達維亞本。有關這時期不同中文聖經譯本的研究，參閱蔡錦圖：《聖經在中國（附中文聖經歷史目錄）》，道風書社，2018，第146、147、149、150頁。關於四人小組譯本的研究，可參閱蘇精：《中文聖經第一次修訂與爭議》，《鑄以代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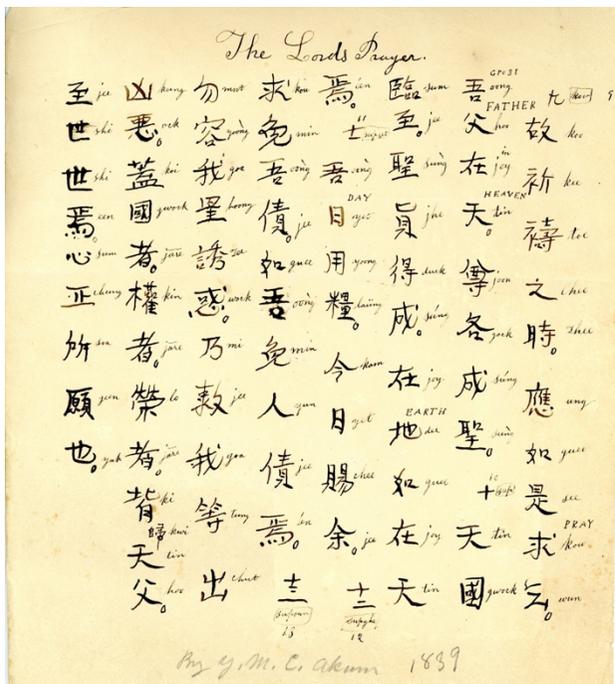


插图 3: 杨文俊赠送禧尔的亲笔手抄的《主祷文》

美国麻省伍斯特历史博物馆档案与图书提供

九故祈祷之时，应如是求云：/吾父在天，尊各成圣。十天国/临至，圣旨得成，在地如在/天/焉。十一吾日用粮，今日赐余。十二/求免吾债，如吾免人债焉。十三/勿容我室里诱惑，乃救我等出/凶恶。盖国者、权者、荣者皆归天父，/至世世焉。心正所愿也。

上引小字为经节号码。今天的读者，特别是没有基督教知识背景的读者，大概无法读懂这几节经文的意思，因此笔者将和合本译文译录如下：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杨文俊在抄录主祷文后，用粤语读出每一个字的读音，然后禧尔以罗马拼音标记在每一个字的旁边；他也提供文中几个汉字的英语译词（见插图 3）。⁶²如果我们以它和杨文俊据以抄录的原文仔细比读，发现其中有不少错误。

先说笔误。共有四个：

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台大出版中心，2014，第 121~165 页；唐子明：《启示与文字：中文圣经翻译的故事》，天道书楼，2018，第 102~105 页。

⁶² *The Centenary of Leicester Academy Held September 4, 1884*, p. 79.

(1) 第 9 节，原文“尊名成圣”，“名”，粤语读音 meng，⁶³，杨误写作形近之“各”字，更据之错读作 gock；⁶⁴

(2) 第 10 节“圣旨得成”，“旨”字下半部“日”，杨文俊笔误作“貝”；

(3) 第 13 节“乃救我等出凶恶”中的“救”，字体左边“求”，杨文俊在横画下写多了一个“口”（如“束”之上半部）；

(4) 第 13 节“盖国者、权者、榮者皆归天父”，“皆”字上半部“比”，杨笔误作“北”。这四个笔误也出现在《纽约本主祷文》中。⁶⁵

次说读音。有三个误读：

(1) 第 10 节“天国临至”，“临”，粤语读作 lam，⁶⁶ 杨文俊错读作 sum；

(2) 第 13 节“勿容我罣诱惑”，“罣”，“挂”之异体字，粤语读音是 kwá，⁶⁷ 杨误读作 hoong；

(3) 第 13 节“榮者皆归天父”，“榮”，粤语读作 wing，⁶⁸ 杨误以为是形近之“勞”字，念作 lò。⁶⁹

三说字义。从禧尔记录几个汉字的英语译词如“求”、“父”、“天”及“地”是正确的，但第 9 节“吾父在天”的“吾”，杨文俊甚是离谱地将这个常用字误译作“great”。

在一段仅有八十二个字的文字里，竟然出现如此之多的笔误、错读与误解，特别是极其普通常用的“名”、“吾”二字，在在显示杨文俊在赴美之前，仅在家乡读过几年书，所认识的中文字极其有限，水平是非常差劣。它证实裨治文所说，绝非虚言。

四、为英国政府服务

杨文俊待在鲍留云那里时间不长，仅有几个月。此后，他受聘成为英国战舰“都鲁壹”舰长亨利·士密（Capt. Henry Smith, 1803-1887）⁷⁰ 的口译员。

在英国海军史与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史上，士密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1839 年 1 月 19 日，为了剿灭在红海掠夺英国商船的海盗，保证出入红海的安全，在佰尔里少校（Major T. Baillie）指挥下，士密率领载炮二十八门的“窝拉疑号”（*Volage*）军舰炮轰占领了位于阿拉伯半岛南部扼海

⁶³ Eitel, *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p. 431.

⁶⁴ “各”，欧德理《粤语词典》拼写作 kok。参阅 Eitel, *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p. 272.

⁶⁵ 又，《纽约本主祷文》第 9 节把“吾”误写作“五”。

⁶⁶ Eitel, *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p. 342.

⁶⁷ Eitel, *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p. 314.

⁶⁸ Eitel, *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p. 943.

⁶⁹ Eitel, *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p. 378.

⁷⁰ 有关史密的海军事业，参见 William R. O'Byrne, *A Naval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London: John Murray, 1849), p. 1085.

上交通要道、可以为船只提供补给的亚丁港。⁷¹ 四个月后，感到英国人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印度总督应义律的要求下，调遣士密率领“窝拉疑号”等舰船从印度军事基地启航开往中国。8月30日，“窝拉疑号”开抵粤海，舰长士密受委为英国海军驻华司令。⁷²

士密与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前后几次的前哨战都有直接的关系，其名字屡见于林则徐的奏折中。1839年9月4日，为求林则徐接济英国人的给养，士密与义律乘坐“路易莎号”与开到九龙山附近海面，向大鹏营参将递送一份“抗议书”，由于中方在限定半小时后仍然不加理会，英方下令开炮轰击师船，引发鸦片战争的第一次交火。⁷³ 10月28日，为阻为挡英商船“皇家萨克马逊号”（*Royal Saxon*）报关入口，士密下令炮击水师提督的师船，引发穿鼻之战。⁷⁴ 1840年8月19日，因英牧师温森特·士丹顿（Vincent Stanton）在澳门卡思兰湾被绑架案，英兵在士密指挥下，乘“进取号”偷袭关闸炮台，史称澳门关闸之战。⁷⁵

1839年10月18日，英国议会已决定向中国发动战争。⁷⁶ 英国的海陆军从本土、南非、印度、锡兰源源向中国开去。¹ 其中装载有四十四门大炮第五级护卫舰“都鲁壹号”由舰长约翰·丘吉尔（John S. Churchill, 1797-1840）指挥，受命为珠江中的海军指挥官。“都鲁壹号”自悉尼启航，1840年1月，抵达澳门。不料五个月后，1840年6月3日，丘吉尔病逝。⁷⁷ 就此，“都鲁壹号”舰长与海军指挥官之职便由士密接续。

在近代中英交往的过程里，中英双方均面对缺乏精通英汉双语的人才，英方能胜任这工作的，仅有马儒翰、郭实猎、罗伯聃三人。九龙之战期间，英方翻译是郭实猎，⁷⁸穿鼻之战时则是马儒其

⁷¹ R. L. Playfair, *A History of Arabia Felix or Yemen,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hristian Era to the Present Time* (Bombay: Printed for Government at the Education Society's Press, 1859), p. 163.

⁷² 据士密给林则徐的文书，自称其职称作“英吉利国水师总管官”。参阅（日）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第246页。

⁷³ 有关九龙之战，参阅 Hsin-pao Chang,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202-203；杨国桢：《林则徐大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315~317页。

⁷⁴ 关于穿鼻之战，参阅 Chang,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pp. 203-206；杨国桢：《林则徐大传》，第338~340页。

⁷⁵ 有关澳门关闸之战，参阅“Journal of Occurrence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9, no. 4 (August 1840), pp. 233-240；杨国桢：《林则徐大传》，第381~383页。

⁷⁶ 来新夏编著：《林则徐年谱新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第364~365页。

⁷⁷ 约翰·丘吉尔是20世纪四十年代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Churchill）的先祖。参阅 Lindsay and May Ride, *An East India Company Cemetery: Protestant Burials in Macao*, abridged and edited from their manuscripts with additional material by Bernard Mello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44-45, 215-216.

⁷⁸ Chang,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p. 202.

人。⁷⁹ 鴉片戰爭正式爆發後，商務監督聘請的這三名專職翻譯均得隨英國遠征軍北上，負起重要的任務，英方急需聘用一些懂得中文的中國人來填補空缺。⁸⁰ 1841年10月，年僅十三歲的巴夏禮（Harry Parkes, 1828-1885）從英國抵達澳門，向馬儒翰學習中文。馬儒翰寫信與他的大姐說，“我們非常需要翻譯官……就目前而言，只要他能說一丁點兒中文，我們也將很樂意接受他。”⁸¹ 就是在那種翻譯員奇缺、餓不擇食的情況下，楊文俊得傳教士的舉薦，⁸² 受聘成為“都魯壹號”艦長士密的一名口譯員，時間大概在8月澳門關閘之戰之後。

1841年8月26日，英軍攻陷鼓浪嶼與廈門，⁸³ 在約翰斯頓少校（Major Johnstone）率領下留駐鼓浪嶼， “都魯壹號”、“卑拉底士號”（*Pylades*）和“阿爾吉林號”（*Algerine*），士兵五百六十名駐守鼓浪嶼。⁸⁴ 主力部隊撤離廈門，北上浙江。《江寧條約》簽訂後，為確保清政府付還條約中規定煙價、軍費等賠款，英軍繼續駐紮在鼓浪嶼島上三年多。就此楊文俊也留在鼓浪嶼一段時間。

有關楊文俊為英軍服務的記載，筆者目力所及，僅見一則。1841年9月，英國雙桅運輸船“納爾不達號”（*Nerbudda*）被強烈的台風吹斷桅杆。受損的船往雞籠港（今基隆）逐漸飄去，船上二百多名船員大部分被村民救起，轉交官府。1842年3月5日，怡和洋行雙桅“阿訶號”（*Ann*）鴉片船在強風驟雨中，誤觸暗礁，最終擱淺於台灣淡水與雞籠之間洋面，船上五十餘名英人被台灣官兵束手就擒。在這兩起海難事件中，台灣守軍共獲英俘187名。除了在監在途病斃、或被處決外，倖存者僅有少數。台灣道姚瑩（1785-1853）、台灣鎮總兵達洪阿（?-1854）向清廷虛報發炮敗敵的“勝績”，道光帝厚賞二人。⁸⁵

⁷⁹ Austin Coates, *Macao and the British, 1637-1842: Prelude to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98; 沈渭濱：《道光十九年---從禁煙到戰爭》，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第293頁。

⁸⁰ 例如英國遠征隊戰艦上就有廣東香山人布定邦。參閱全國公共圖書館古籍文獻編委會《夷匪犯境聞見錄》，中華全圖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5，第59頁。

⁸¹ 轉引自Stanley Lane-Poole, *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 Vol. 1: Consul in China* (London: MacMillan, 1894), p.14.

⁸² 引薦楊文俊給士密的傳教士可能是衛三畏。衛三畏在他那篇《瀛環志略》書評中說，楊文俊的中文與廈門話表達能力有限，以致外國人和中國官員對他的翻譯都不滿意。這顯然是士密或其他英國官員告訴這位推薦人。

⁸³ 有關英軍占領廈門的詳情，參見“London Gazette, February 1842,” and “Asiatic Intelligence. China,” in *The Asiatic Journal and Monthly Register for British and Foreign India, China and Australasia*, vol. 37 (New Series), no.146 (Feb, 1842), pp. 108-109 & 155.

⁸⁴ A Field Officer, *The last Year in China, to the Peace of Nanking: As Sketched in Letters to His Friend*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43), p. 81.

⁸⁵ 《達阿洪等奏英官投書未交釋放英人已獲送內渡折》及《達洪阿等奏嚴訊戰俘情形折》，《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中華書局，第1773~1774、2484頁；章瑄文：《紀實與虛構---鴉片戰爭期間台灣殺俘事件研究》，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第107~135頁。

《江宁条约》签订不久后，1842 年 10 月 8 日，自厦门乘配备十六门炮双桅炮舰“蟒蛇号”（*Serpent*）舰长内维尔（H. Neville）“带同夷目四人及通事一名”，携带英军统领文书，驶入安平港索俘，据《中华论丛》的报导，该名通事即 Akum，⁸⁶ 也就是杨文俊。交涉结果，达洪阿等遣人将俘虏“乘快船星夜径送厦门，交鼓浪屿夷官”。⁸⁷ 在获知英国俘虏仅有九名还活着，英方要求清廷斩首下令处决船员的官员。于是清廷命闽浙总督怡良赴台查办，发现整起事件是姚莹、达洪阿“冒功欺罔”，就此将两人革职。⁸⁸

1845 年 3 月 22 日，清政府支付了第五批也是最后一批的赔款后，英国的卫戍部队才从鼓浪屿撤离。⁸⁹ 由于史料匮乏，我们无法知道杨文俊与英军的雇主/职员关系是否继续维持。只知大约在 1844/45 年间之后一段时间，正好徐继畲开始在撰写《瀛环志略》，由于杨文俊懂得英语，又有世界地理历史等新知，于是徐继畲通过其下属霍明高请求他释疑解难，特别是世界地名的厘定。⁹⁰

十多年后，杨文俊又再次受英国政府之聘，到英国驻日本公使馆做一名仆役。

随着美国在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建立正式统治后，一些美国人认识到，太平洋海岸线是中国的经济机遇。1853 年和 1854 年连续两年美利坚合众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M. C. Perry, 1794-1858）海军准将率领的“黑船”舰队开到日本江户湾，要求友好通商。1854 年 3 月，美国与日本在横滨签订《日美亲善条约》，日本同意开放下田和箱馆（今函馆市）两处港口通商，美国在下田设立领事馆。日本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打开了两百多年的锁国政策。10 月，英国又与日本签订

⁸⁶ 《中华论丛》原文：“Akum acted as interpreter”。达洪阿等奏文云：“该通事林金回称：‘此信并非伊写，约知信内是要讨淡水所获夷人及本船银物等语。’”，亚金（杨文俊）姓杨，不是姓林，当时中英在交涉过程中，只有一位华人通事，不知是杨文俊有意隐瞒其真实姓氏，抑或其他原因。参阅“Journal of Occurrences:Visit of H.M. Brig *Serpent* to Formos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1, no. 11 (November 1842), p. 627; 《达洪阿等奏英官投书未交释放英人已获送内渡折》，思齐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第 2484 页。

⁸⁷ 《达洪阿等奏英官投书未交释放英人已获送内渡折》，载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2484 页。

⁸⁸ 有关纳尔不达号事件与大安之役，参阅“Journal of Occurrences:Visit of H.M. Brig *Serpent* to Formosa,” pp. 627-629; “Asiatic Intelligence. China,” *The Asiatic Journal and Monthly Register for British and Foreign India, China, and Australasia*, vol. 40, no. 159 (March 1843), pp. 280-282; Shih-Shan Henry Tsai, *Maritime Taiwan: Historical Encounters with the East and the West*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2009), pp. 66-67; 李祖基、陈忠纯：《社会转型、抗击外侮与近代化建设---晚清台湾历史映像（1840-1895）》，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第 9~20 页。

⁸⁹ John King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203; Robert Nield, *The China Coast: Trade and the First Treaty Ports*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2010), p. 99.

⁹⁰ 以徐继畲一个封疆大臣的身份，不太可能亲自向杨文俊请教。道光二十八年（1848）福建抚署《瀛环志略》刻本目录第 1 页有“沁水霍明高蓉生采译”诸字，霍明高不谙外语，“采译”二字显示指徐继畲是通过其下属霍明高间接向杨文俊咨询请教。

《日英親善條約》。1858年，那位下令火燒圓明園、時任英國駐華公使額爾金到日本，與幕府按稍早前與美、荷、美等國所簽條約的內容，簽署了日英通商條約。翌年，長崎、箱館、橫濱等地正式對英、美等五國開放通商。7月，那位曾在福州擔任英國領事期間，為徐繼畲就地理問題解疑釋難的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 1809-1897）受委為英國駐日本總領事，在江戶（今東京）開館。

⁹¹ 楊文俊就在這時隨阿禮國到日本。⁹²

筆者所見到楊文俊在日本的活動僅有一記載。1865年，與英發聯軍火燒圓明園有密切關係的巴夏禮結束北京的工作，到日本接繼阿禮國，成為英國駐日本的第二任公使。1867年1月30日，孝明天皇駕崩，年僅十五歲的明治天皇續位。為了增強威信，坐鎮在大阪的德川慶喜大刀闊斧地實施了很多政治與軍事上的改革，也邀請外國公使代表到大阪，履行友好條約，希望改變過去八年的攘夷政策。英國外交官薩道義（Sir Ernest Satow, 1843-1929）⁹³ 接受德川的邀請，一行七人，從橫濱出發，前往大阪。途中遊覽時拍下一張團體合影照。⁹⁴ 合照中人物有薩道義及其兩個日本僕役（retainers）、⁹⁵ 二等秘書米特福德（A. B. Mitford, 1837-1916）⁹⁶ 及其華人貼身隨從（servant），

⁹¹ Rutherford Alcock, *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 (New York: The Bradley Co., [1863]), p. 150.

⁹² 在中國，英國領事從一地轉到另一處時，出于方便溝通，常攜帶曾一起共事的職員，例如記里布隨身帶廣東通事前往廈門，羅伯聘出任主寧波領事，隨員多達十五人，包括廣東僕人。再者，1844年11月至1845年3月，阿禮國擔任英國駐廈門領事，他應該認識那個為英國政府服務的楊文俊，故此我們有理由相信阿禮國攜帶楊文俊到日本。參閱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p.20.

⁹³ 這時，薩道義是一名實習譯員。至1868年1月1日，他才升遷為日語秘書。關於薩道義的生平，可參閱 P. F. Kornicki, “Ernest Mason Satow (1843-1929),” in *Britain and Japan, 1859-1991*, edited by Sir Hugh Cortazzi and Gordon Daniel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p. 76-85.

⁹⁴ 這張照片見於薩道義的回憶錄 *A Diplomat in Japan* (Toky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第192~193頁之間。精一坂田的日譯本（《一外交官の見た明治維新》，岩波書店，1960）及譚媛媛中譯本（《明治維新親歷記》，文匯出版社，2017）都沒把這張照片收入書內。

⁹⁵ 他們是野口富作、安次郎。薩道義回憶錄載：“The bottom was occupied by the Japanese writers and my retainers”（一樓住着日本人秘書和我的僕人），此處 retainers（僕人）是個複數詞，可見薩道義有超過一個僕役。回憶錄稱野口富藏是他的僕人（my retainer Noguchi）。1867年2月14日，薩道義寫信給宇和島藩（今四國西部愛媛縣宇和島市）域松根藏，感謝他善待野口富藏與安次郎（回憶錄原文：Noguchi and my boy Yasu），可見兩人皆是其隨從：前者協助與日本人聯繫，後者僅是雜役。野口富作是會津人，是一名武士，1866年，薩道義聘用他。有關其生平，國米重行之《野口富藏伝：幕末英國外交官アーネスト・サトウの秘書》（歷史春秋，2013）記之極其詳細。參見 *Diaries and Travel Journals of Ernest Satow (1861-1926)*, vol. 1 (1861-1872), pp. 186-187;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p. 186, 197 & 200; Bernard M. Allen, *The Rt. Hon. Sir Ernest Satow: A Memoir*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933), pp. 52-53.

⁹⁶ 密福特1837年在倫敦出生。1858年進入英國外交部，在聖彼得堡擔任駐俄國大使館三等秘書。1865至1866年自願到北京英國駐華使館人參贊。1866年9月奉調去日本，擔任二等秘書。

⁹⁷ 及一个四五十岁、头戴瓜子帽的 Akum (即杨文俊)。⁹⁸ 这是杨文俊受聘到日本工作的惟一证据。至于杨文俊工作至哪一年, 由于没有史料, 只好阙如。

五、昔日同窗哈佛大学校长对杨文俊的怀念

时光荏苒, 杨文俊回国转瞬已经几十年了, 但在大洋彼岸昔日同窗始终忘不了这个异域基督徒的传奇性经历, 脑海中一直保留着当年杨文俊留给他们难以磨灭美好、深刻的印象。同学中与杨文俊最为亲密、情谊最为深厚的是禧尔。1884 年, 如果杨文俊尚健在, 已是七旬左右的老人了。这年, 莱斯特学校庆祝建校一百周年, 七百名老师校友出席这个盛大的庆祝晚宴。禧尔受邀在晚宴上讲话。他说虽然他在莱斯特只有短短几个月, 却特别怀念年轻时班上那位“温文尔雅、可爱、聪明的华人同学”(the mild, lovable, intelligent Chinese classmate) 的中国同学杨文俊。他也提及杨文俊赠送与他的《主祷文》, 并勉励大家向杨文俊学习。⁹⁹

禧尔比杨文俊年长三四岁, 1818 年在新泽西州的新版伦瑞克 (New Brunswick) 出生。受母亲影响, 是个虔诚基督徒。年轻时就想进入哈佛神学院学习。¹⁰⁰ 1838 年 5 月, 他先进入莱斯特学校古典部门学习拉丁文、希腊文与《新约》。禧尔与杨文俊感情融洽。在校期间, 杨文俊向他讲述在家乡的童年生活趣事, 他如何从一个不相信任何宗教的青年, 梯航万里抵达纽约, 最终皈依基督教的故事, 以及将来回国后献身宣教的想法。¹⁰¹ 原本禧尔打算在莱斯特学校学习五个学期, 直到 1840 年 5 月, 但后来却改变想法, 只待了八个月, 1839 年就转入哈佛学院学习, 那年正是哈佛大学创立一百周年。¹⁰² 杨文俊在该年毕业后, 报入威廉斯学院。两人就此分道扬镳, 以后未再晤面。

⁹⁷ 即绰号“哲学家”的 Lin-fu。按, 关于 Lin-fu 的名字, 精一坂田的日译本以片假名リン・フー译出, 谭媛媛的中译本则译作林富, 惟据他本人的亲笔签名, 当作“林福”。又, 密福特在北京时, 其随从名为 Chang Hsi, 据此, 林福应不是他从中国带过去日本。参见 *Mitford's Japan: Memories and Recollections, 1866-1906*,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Hugh Cortazzi. Revised edition (London: Japan Library, 2002), pp. 49 & 59; *Diaries and Travel Journals of Ernest Satow (1861-1926)*, transcribed and annotated by Shinichi Miyazawa (Singapore: Cengage Learning Asia, 2015), vol. 1 (1861-1872), pp. 161 note 117, 191 & 223; (英)アーネスト サトウ著, (日)精一坂田译:《一外交官の見た明治維新》(岩波书店, 1960), 第 20 页; (英)萨道义著, 谭媛媛译:《明治维新亲历记》, 文汇出版社, 2017, 第 225 页。

⁹⁸ 杨文俊在受英国政府聘用期间, 乳名“亚锦”改作“亚金”(粤语“金”、“锦”读音均读作 kum)。查阅萨道义日记, 这帧照片背面, Akum 的亲笔签名作“亚金”。从照片看, 他是四十多岁左右的中年人。杨文俊于 1821 年或 1822 年出生, 到 1867 年已是四十五、六岁, 因此, 笔者深信照片中的 Akum (亚金) 就是杨文俊。参阅本文注 87; Eitel, *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p. 213;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p. 186 & 193; Ernest Satow, *Diaries and Travel Journals of Ernest Satow (1861-1926)*, vol. 1 (1861-1872): *China & Japan*, p.191.

⁹⁹ *The Centenary of Leicester Academy Held September 4, 1884*, pp. 79-80

¹⁰⁰ Land, *Thomas Hill*, pp. 3-19.

¹⁰¹ *The Centenary of Leicester Academy Held September 4, 1884*, pp. 79-80 & 102.

¹⁰² Land, *Thomas Hill*, pp. 3-19 & 33.

自 1843 年自哈佛學院畢業後，禧爾又進入哈佛神學院學習兩年。畢業後，他出任麻省沃爾瑟姆（Waltham）獨神派教堂（Unitarian Church）牧師長達十四年。1859 年，他出任俄亥俄州的安提阿學院（Antioch College）院長，兼任辛辛那提（Cincinnati）救贖主教堂（Church of the Redeemer）的牧師。兩年多後，1862 年，他出掌哈佛大學，成為該大學第二十任校長，至 1868 年 9 月因健康問題辭職。晚年，他擔任緬因州波特蘭（Portland）第一獨神派教堂（First Unitarian Church）的牧師。禧爾既是一位科學家、神學家，也是哲學家、教育學家。在數學、天文學期刊及宗教報刊上發表論文多篇。¹⁰³

楊文俊有繪畫天賦。在萊斯特學校時，他送禧爾三件紙質紀念品。從經濟價值的視角看，它們絕不是珍貴的東西，然而，幾十年來，這位大學者又是牧師一直珍惜保留，直到晚年，才捐獻給麻省的伍斯特古物協會保存。它們的存世，見證一位牧師對一個異域弟兄純真友誼的珍惜。1891 年 11 月 21 日，禧爾靜悄悄離開人世，享年七十三歲。¹⁰⁴

又過了二十七年，1911 年，壽逾耄耋的老同學愛德華·羅德牧師（Edward Lord）仍忘不了這個異邦教徒。當他見到剛在去年刊行的《威廉斯學院肄業生名錄》里有楊文俊之名後，勾起了七十多年前他在學校與楊文俊愉快相處的日子，也記起楊文俊決志獻身宣教的故事。¹⁰⁵ 羅德是在 1839 年與楊文俊一同進入威廉斯學院一同學習。¹⁰⁶ 1843 年，自威廉斯學院畢業後，他即進入奧本神學院（Auburn Theological Seminary）接受受訓，畢業後加入荷蘭歸正教會（Dutch Reformed Church）擔任牧師，畢生獻身教會，先後在紐約州的羅繆勒斯（Romulus）、富爾頓（Fulton），以及新澤西州的亞當斯（Adams）、梅塔欽（Metuchen）等地牧會。就在羅德牧師慶祝百歲生日兩天之前，1921 年 3 月 27 日，他撒手歸去。¹⁰⁷

結語

自 1851 年衛三畏揭露徐繼畬在撰寫《瀛環志略》期間，一位在美國讀書四年的年輕華人曾給予襄助。雖然知道這個在鴉片戰爭時受聘為英國戰艦艦長士密的翻譯姓名是誰，但為了避免給他帶來麻煩，衛三畏替他隱名埋姓。徐繼畬也只字不提此事。一個世紀後，就如施其樂（Carl T. Smith）發現林則徐四人翻譯團成員的姓名一樣，美國哈佛大學學者羅克威爾從檔案與學校文獻里初步偵破這神秘人物的身份，曉得他的名字叫 Yung Mung Chum Akum，曾先後在麻省的两所学校就读。又过了六十多年，2021 年，笔者发现静荡荡躺卧在纽约历史协会档案库里一页以中文抄录的主祷文，确知这个佚名年轻华人译者的中文实姓真名、年龄与出生地等讯息。2011 年，王宏志教授在

¹⁰³ “Harvard Colleg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9, 1891, p. 11.

¹⁰⁴ Land, *Thomas Hill*, p. 250.

¹⁰⁵ *General Catalogue of the Non-graduates of Williams College, 1910*, p. 19.

¹⁰⁶ *Catalogue of the Corporation, Officers and Students of Williams College, 1839-40*, p. 13.

¹⁰⁷ “Announcements,” *Brooklyn Life* (New York), 2 April 1921, pp. 3 & 12.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译者。下篇：英方译者》提及当时确知中国人担任英方译者有布定邦及十岁的阿发（Afah）等人。¹⁰⁸ 现从本文，我们确定英方译者中多了一位，名为杨文俊。

这篇论文立足于苏精教授所写的有关杨文俊的原创性、突破性文字，结合卫三畏书评中所提供的信息、莱斯特学校记录、英国驻日本公使馆外交官萨道义的日记与回忆录等资料，勾勒出杨文俊的简单生平，对这个英方译者有多一点的了解。我们又从《伍斯特本主祷文》得以窥视杨文俊的中文程度，证实裨治文对其所作的评说是真实与符合事实的。

¹⁰⁸ 王宏志：《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译者。下篇：英方的译者》，王宏志主编《翻译史研究》第二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第 47~49 页。